

继承革命传统 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图书馆

郭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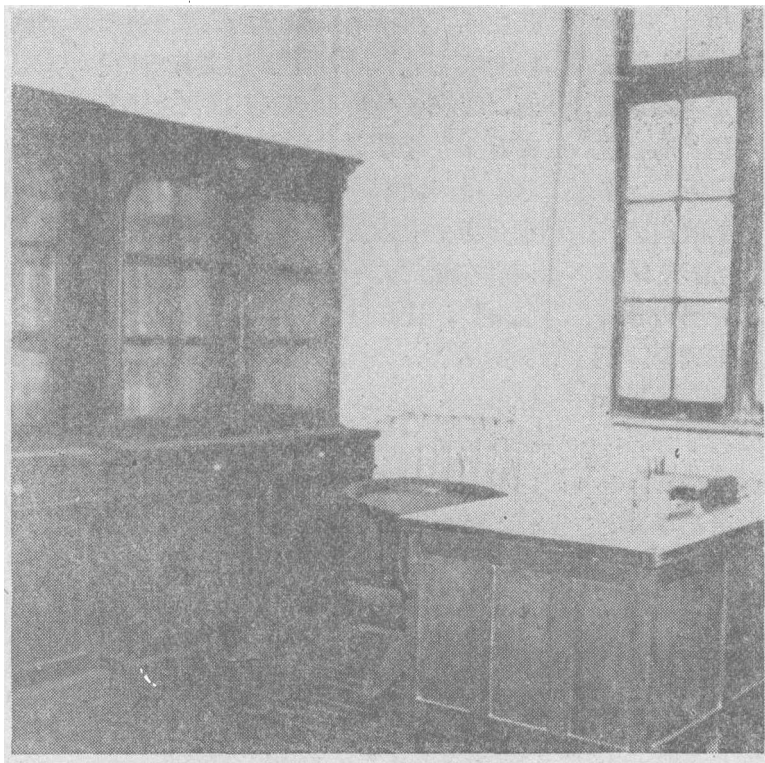
一九一八年年一月李大钊同志经章士钊的推荐，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同年十二月北京地区召开图书馆协会，通过协会章程和附则，李大钊同志被推选为图书馆协会的中文书记，从此，还担负起了领导北京地区图书馆事业的重担。

当时，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指导下，学术争辩风气很盛，各种思想非常活跃，相继组成了许多学术政治团体。北京大学成了新旧思潮斗争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同志来到北大，并且在一九二〇年被选为北京大学教授评议会委员和学校图书委员会负责人。对北京大学的各项活动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更是从根本上明确了无产阶级办好大学图书馆的方向。

李大钊同志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期间，他所主持的图书馆工作，是同他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发展相联系的。他积极购进、搜集扩充藏书，经过努力当时中文图书已有二十多万册，西文书二万多册，日文书一千多册。根据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北京大学日刊》刊载图书馆新书报导，在这些收藏中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马克思全集》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也增加很多，还曾订购了许多国内外的进步刊物，如中文期刊有《新青年》、

《先驱》、《每周评论》等，外文期刊有《苏维埃，俄罗斯》等，还曾经专门开辟过外文报刊阅览室和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的专题阅览室。具有这样传播新思潮，新文化物质基础的北京大学图书部，就成了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中心。当时青年学生经常到图书部找李大钊同志向他请教，找他讨论各种问题，李大钊同志即把有关的马克思学说书籍介绍给他们看，当面指导他们，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并指导他们的阅读方法，这时图书馆的阅览人数大量增加。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李大钊同志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的工作室

一九一八年八月北大红

楼建成，十月十四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即刊登了图书部主任告白：“图书馆拟迁新楼……”，十月二十三日在李大钊同志亲自领导下完成了迁馆任务。将红楼第一层，分为二十一个书库，建立了中文、西文、日报杂志等六个阅览室，红楼下层南头一连两间里间是主任办公室，外间是会议室，青年学生们经常利用外间会议室开会、研究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北大各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活动，如康德哲学研究等经常在图书馆内举行。

同年，还向全校公布了《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通知读者按《修正借书规则》借还书，这个《修正借书规则》是经过李大钊同志亲自批改、亲自提交学校评议会议决通过的，主要是解决借书长期不还，严重影响图书周转率，而采取“过期交纳违约金”并用“累进法，每逾七日增加违约金率一倍，至该书原价之三倍为止”等措施，以提高图书馆流通率，更好的保证教学用书的流通使用。

为了扩充藏书，《北京大学日刊》上还公布过“私人图书寄存简章”，规定“寄存图书，供教职员学生或公众阅览”但“限在室内阅览，概不出借”等项制度。同时，为了更好的解决大学图书馆集中与分散的问题，决定“各研究所书籍，均归图书馆登录编目”后，再分散到各研究所使用。明确各研究所订报刊要“协商分购，互换陈列”。还决定西文书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编制卡片目录，尽量使图书馆工作加强科学管理，充分发挥作用。

一九二〇年五月校图书委员会在李大钊同志亲自主持下，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部试行条例，决定图书部调整机构为：登录、购书、编目、典书四课，并明确规定了各课的主要职责和具体要求。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文科教授刘复“对于改良北京大

藏书学的人，但是我知道图书馆是书的第二生命……，我又知道北京大学图书馆万不可以不改良，而且不可不紧急改良。这是就我数年来对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但是我又知道我的朋友李守常自从做了图书部主任以来，没有一天不诚恳，很刻苦的想法改良，而且还曾几次会议请校内几位注意收藏事业的教授同他设法改良。”这个意见充分肯定李大钊同志到馆主持工作以来所做出的成绩。同时对图书采购工作和编目工作，以及阅览工作提出具体建议。同年八月十二日学生李良骥

“筹办北京大学图书馆计划书”，“章程”和“北大图书馆奖励捐助的办法”如何进一步改进图书馆工作和筹建新馆提出建议和措施，使得图书馆的工作为教师学生所关心。

当时，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历史系、法律系开有“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还在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同时又在北高女高师、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一九二〇年三月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有组织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会员以北大学生为主。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把搜集马克思主义书籍“做为研究上的重要任务”地收集德、英、法、日及中文马克思主义书籍，到一九二二年二月研究会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四十八种；中文本《马克思主义入门》（李汉俊译）、《马克思经济学》（李达译）和《到自由之路》（雁冰）十七种；杂志报纸《新青年》、《工人周刊》、《晨报》、《时事新报》等二十种。另外还订购了一批外洋

英、德、法三种文字的《马克思全集》等。规定“本会书籍会员得自由借阅，但须限制速还……”。规定借书时间是“每日下午四时至八时开馆，惟星期日则在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会员借书“不限册数”，“借期至多不得过一星期。”通过这些规定充分保证了会员的研究活动，这些马克思主义书刊当年随时有被反动当局查封的危险，因而把这个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慕义斋”（即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以避免反动政府的破坏，至今北大图书馆珍藏的革命文献中还保存有列宁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伟大的创举》等德文书籍盖有“亢慕义斋图书”的方印，这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李守常启事，鄙人已辞图书部主任职，本校同人如有关于图书部的事件，乞与图书主任皮皓白先生接洽可也。”至此正式辞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的职务。

李大钊同志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期间，不仅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领导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给北大图书馆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对于图书馆事业也极多建树，他对图书馆工作的深入研究和具体实践，丰富了我国无产阶级的图书馆学理论，奠定了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基础，对于我们今天后来学习和工作在北大图书馆的同志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图书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李大钊同志在主持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光辉业绩中，最为重要的，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应努力继承和发扬。

1.明确了大学图书馆的办馆方向。李大钊同志早在一九一九年即指出：“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并且具体地说：“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要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而“现代图

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能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作用”。李大钊同志还身体力行，充分利用图书馆这个阵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反帝反封建，传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注意教育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积极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的道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学图书馆，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培养出更多的符合现代化需要的建设人才服务。

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也十分重视利用图书馆藏书，保证学生学好专业课程和扩大知识领域。他指出：“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学校图书馆和教授法有密切的关系……，在教科书和讲堂以外还由教师指出许多的参考书作学生自学的材料。”主张“图书馆增加图书复本……供学生参考”。

2.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图书馆的方法是坚决贯彻群众路线，积极依靠群众。李大钊同志主持图书馆工作期间，积极参加群众活动，对于改进图书馆工作更是广泛征求教师学生的意见，采取有力措施，改进工作并及时的向全校师生公布，得到广大群众支持。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北大日刊》刊登了刘复教授“对于改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五日《北大日刊》刊登顾颉刚教授草拟的“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三日《北大日刊》所刊登吴康关于“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之商榷”。这些师生对改进图书馆工作提出的积极建议和对工作改进的不同意见的讨论，都充分说明李大钊同志是积极依靠群众，十分关心读者的需要，不断改进工作的。工作有改进即在《北大日刊》上登出布告，如改用分类法以后，就登出：“望同学诸君检查之际遇有不合，随时指告，必需力求改善。”图书馆开架的期刊发现有人撕毁也及时在校刊上登出布告：“近来发现数种杂志里的重要论文被人撕去，此类事惟有请阅书报者自

重。”另外为了加速图书流通，还常用图书部主任名义出布告催还图书并把久借不还人的姓名在校刊上公布，发动群众检查督促。图书部收到新的书刊也都及时的在校刊上公布。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还在校刊上登载了“图书馆征求‘五四’前后各处定期出版物的启事。”要求师生捐赠并随时代为收集当时的出版物等等。李大钊同志这种深入群众，依靠群众，面向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3. 重视图书馆学理论的探讨和工作方法的研究和改进，提倡管理图书的都要不断提高水平。

李大钊同志在当时革命工作极为繁忙，教学任务也很繁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对图书馆学理论的探讨，他曾在北京女高师兼授过图书馆学课程，还作过不少关于图书馆工作方面的专题演讲，注重提高管理水平。

对图书馆的具体工作更是深入研究，经常提出改进措施并积极付诸实践。如对图书采购工作，提出要对各类图书“兼容互需”。对外国科学文化要“取长补短，相互促进”。选书“必须经过具有专门学识的人审查”，才能经济，符合实用。认为闭架“取书的手续非常麻烦”主张开架阅览，提出减化借阅手续，认为这是“图书馆的新趋势”。还提出大学图书馆一定要“增聘助教式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开展读者参考工作，并且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亲自将这个建议提交校评议会正式通过决议付诸实行。对于图书分类改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和改换卡片目录，都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然后做出符合客观发展趋势的决定，使图书馆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改进提高。这些都充分说明李大钊同志非常

重视研究改进图书馆工作。

4. 注意学习吸取国内外的先进工作经验。李大钊同志非常注意学习和介绍外国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经验。他曾利用赴苏联参加党代会的时机，注意对苏联图书馆事业的考察，曾到列宁格勒的海员俱乐部图书馆调查了解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管理人员水平和管理经验。一九二一年六月李大钊同志曾亲自接待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派遣汉文书籍编目员卫德女士到校参观图书馆，互相交换了关于汉文书籍的编目方法。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北京《晨报》付刊上还发表过介绍《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图书馆员教育发展和课程设置情况。还曾经介绍过美国图书馆的开架管理制度和开展参考辅导工作的经验。对国内图书馆界的工作经验也十分重视，一九一八年三月李大钊同志曾“亲自率领北大图书馆职员等人赴清华学校参观图书馆”。首先参观了清华新图书馆的建筑，了解清华图书馆购书审批制度和书刊借阅办法，对清华图书馆编制期刊索引的工作极为赞赏，给予高度评价，回校后在《北大日刊》上作了详细介绍。对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积极提出建议，希望他们能“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练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知识”。并认为“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这些都启示我们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把大学建成“两个中心”服务的形势要求下，一定要解放思想，不断学习新事物研究新问题，认真地研究、比较、鉴别、吸取国外现代的先进管理经验，为加速实现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现代化，为发展我国更先进的图书馆事业努力做出贡献。